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四卷)

16 世纪、17 世纪  
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UME IV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EDITED BY  
E. E. RICH

*Formerly Vere Harmsworth Professor of Imperial and  
Naval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Master of St. Catharine's College*

AND

C. H. WILSON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Fellow of Jesus College*

# 剑桥欧洲经济史

---

(第四卷)

## 16 世纪、17 世纪不断 扩张的欧洲经济

E. E. 里奇 C. H. 威尔逊 主编

张锦冬 钟和 晏波 译

徐强 校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4卷, 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  
欧洲经济 / (英) 波斯坦等主编; (英) 里奇等分册主编;  
王春法等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10

书名原文: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SBN 7-5058-2888-6

I. 剑... II. ①波... ②里... ③王... III. 经济史  
—欧洲—16~17世纪 IV. F1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2981 号

##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四卷)

### 16 世纪、17 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

E. E. 里奇 C. H. 威尔逊 主编

张锦冬 钟和 晏波 译

徐强 校订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036

总编室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佳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42.75 印张 2 插页 740000 字

2003 年 10 月第一版 200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册

ISBN 7-5058-2888-6 / F · 2256 定价: 8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译 序

## (一)

所谓经济史，无非就是有关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的历史，是历史演进的经济方面，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活动的总称。但是，作为经济科学领域的一门边缘学科和基础学科，经济史又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既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没有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也就失去了依据和方向。

关于经济史在经济科学中的地位 and 作用，似乎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会对此加以否认，而且许多国外著名经济学家也都精心撰写过经济史著作，如刘易斯关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研究、弗里德曼关于美国货币史的研究等等。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要进行经济学研究，有三门专业知识必不可少，即经济史、经济理论与经济统计，其中经济史最为重要。“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这是因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

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sup>①</sup> 麦克洛斯基更在 1976 年对经济史与经济科学的关系做了精辟入里的论述。根据麦的观点，经济史学科本身的实际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它可以提供更多的经济事实，更好的经济事实，更好的经济理论，更好的经济政策，更好的经济学家；而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学科的贡献是：更多的事实，更好的事实，更好的假设，更好的数据解释，更好的历史学家。<sup>②</sup>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繁荣，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战后初期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对经济周期史的研究以及对美国历史上国民收入账户的考察，美国经济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济模型和假设检验来研究经济史，从而使经济史的量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一相得益彰的结合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sup>③</sup>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迄今还远未建立起来。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经济学家往往对经济史的功能和作用缺乏清楚的认识，甚至有这样那样的贬斥经济史的地位和作用的现象，而真正将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的中国学者，至今还不多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还是世界经济研究，之所以迟迟不能取得较大进展的一个突出原因就是经济史研究的严重滞后影响了理论研究的深入。

## (二)

就其学科体系而言，经济史学科可谓枝广叶茂，体系庞大。

①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29 页。

②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经济史”条。

③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经济史”条。

按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可以有国别经济史、区域经济史、国际经济史（研究国际经济的兴起、崩溃与复兴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来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等；按其涉及的经济部门，可以有农业经济史、工业经济史、银行金融史、贸易史等；按其所研究的历史年代，可以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当代经济史等；按其研究的经济行为主体，可以有企业史、企业家史、总统经济史等；按其研究的经济专题，又可以分为经济增长史、经济危机史、通货膨胀史、钱币史、经济政策史等等。事实上，我们所阅读的经济史著作，大体上都是按照这种学科分野来撰写的。

但是，如果从研究方法来分类，则所有的经济史著作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描述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主要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客观描述，所回答的主要是“是什么”的问题，即在整個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方面是如何演进的？其轨迹如何？作用和意义如何？在这类经济史著作中，虽然我们也能够看出作者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乃至观察问题的角度上受到当时当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它们一般都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以及特定的理论研究方法，而是通过对经济活动的详尽描述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一般而言，由于描述性经济史著作是任何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也是任何严肃认真的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其学术价值也主要在于其对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描述的客观性与全面性，因此，越是客观详尽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就越能够为更为深入的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分析提供一个研究平台和检验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实验场，其学术价值也就越高。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论从史出是这类著作的共同特征。

与此相反，分析性经济史主要依据某种具体的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从而给出自己的解释，并以此证实或者证伪某种经济学理论。它们往往更强调特定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强调将理论

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实际上是更加强调以论带史。在这里，明确的理论依据、内在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严格的推理方法是这类著作的共同特点，其目的不仅是要了解经济史的一般演进过程，而且还要进一步解释某些经济事件在历史上发生的原因、内在的机理、具有的理论含义以及对于经济学理论演进的意义。在这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思堪称先驱。麦迪森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sup>①</sup>也主要是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的：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影响增长实绩的原因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后所附的大量表格主要是对这些经济分析的数据支持。事实上，在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用经济理论去研究历史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趋势。

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而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此高彼低之别。没有一套符合历史发展真实的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分析性经济史，更不要谈高水平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由于描述性经济史也存在着对某些具体经济现象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分析性经济史也需要对经济发展过程给出基本的描述，因此，具体到一部经济史著作究竟是描述性的还是分析性的，只能依据其基本倾向性做出判断。据此推断，我们可以说《剑桥欧洲经济史》是一部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尽管其中的许多作者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以及美籍俄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隆等。

### (三)

既然以应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已是当前经济史研究的主流，而《剑桥欧洲经济史》又主要是一部传统的经济史著作，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选择这样一部著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呢？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sup>①</sup>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其一，正由于目前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分析性经济史，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版的世界经济史著作大都受过严重的“理论污染”，是试图从不同视角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加以解释的著作，而纯粹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却比较少见。即使是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这样的综合性经济史著作，也具有明显的制度主义色彩，充满了作者个人对经济发展历史进程的新制度主义式理解和判断。从推动经济史研究深入的角度来看，这固然不错，但是，这样的分析性经济史著作越多，就越需要一些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经济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以便从中抽象出经济演变的内在规律，并据此对现有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观点进行证实或证伪的工作。这是因为，我们研究经济史，首先就要准确地知道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是怎样的，需要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进一步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才能够对这样一个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以便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比较纯粹的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而不是以作者自己的眼光加以选取和解释的经济史著作。这样一种比较纯粹的经济史，事实上就是我们赖以进行研究的基础和标杆，也只有这种经济史著作，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理论实验场的功能，各种经济理论也才能够以不同的透镜来观察和解释这种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才能够真正还经济发展的历史以本来面目。我国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因而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比如说，建国以来，除了樊亢、宋则行等学者主编的四卷本《外国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和三卷本《世界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著作以外，我们只有一些零散的国别经济史著作，如美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苏联经济史或者日本经济史等等，品种和数量都极为有限。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虽然也翻译了一些负有盛名的经济史著作，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布劳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



义》等，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样一些经济史著作仍然属于分析性经济史之列，因而无法给我们提供一部比较纯粹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

其二，《剑桥欧洲经济史》虽然名为欧洲经济史，但它所探讨和涉猎的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欧洲，而是涵盖了世界各个主要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进程，包括美国、拉美、澳大利亚、东亚各国以及俄罗斯等国的现代经济发展进程，因而是一部事实上的世界经济史。我们知道，所谓世界经济史其含义基本有二：一是世界经济的历史，旨在探讨特定阶段世界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而这样一种作为人类历史新现象的世界经济孕育于地理大发现时期，形成于 19 世纪末期；二是世界的经济发展史，旨在探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这样的世界经济史自有人类以来就已经出现了。就前者而言，宋则行、樊亢主编的《世界经济史》可为其代表；就后者而言，我们迄今还没有一部综合详尽的描述性世界经济史著作，而《剑桥欧洲经济史》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增长是从欧洲、特别是从西欧起源的，欧洲经济的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世界的近代经济发展历程。因此，当我们以一种全球视角来考察和理解人类经济活动及其组织的演进时，欧洲作为人类先进经济活动的中心自然会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关注欧洲之发达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同样关注其他地区之为何不发达以及如何才能走向发达，关注欧洲之发达是否是建立在其他国家之不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关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或者说是否能够找到一种共同的繁荣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剑桥欧洲经济史》显然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它本身是研究欧洲的经济发展进程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欧洲国家，而是由此向外延伸至南北美洲、澳大利亚以及远东的日本、中国以及印度等，在欧洲国家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互动中研究和探索欧洲的经济发展规律，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了欧洲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而将整个近代世界经济增长的过程视为欧洲起源并向全球扩散的过程，

这基本上符合历史实际的。不仅如此。由于欧洲联盟是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欧洲经济的一体化正在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世界各国也都正在深入开展欧洲一体化历史与机制的研究，力求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寻求欧洲统一的深刻内涵。对于正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的中国经济界来说，《剑桥欧洲经济史》这样一部具有全球视野的综合性经济史著作显然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

其三，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与理论研究迫切需要这样一部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是最近二十余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而目前中国也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进程。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以制度创新和制度演进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受到广泛的欢迎与青睐，而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诺思等学者对历史上欧洲制度变迁的研究。在其代表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所有权理论等，对西方民族国家经济兴起的过程及原因给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统一。但是，经济史是丰富多彩的，使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它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判断。那么，诺思从制度视角所给出的解释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推动这种历史变迁的内在机制又是怎样维持运转的？除了诺思的解释以外，我们从那一段历史中能否找到另外的解释或者说启迪？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首先就需要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特别是制度创新与演进的历史做出尽可能客观详尽的描述，并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进而由此确认诺思理论中的真理颗粒。惟其如此，学术界对以探讨历史上的经济制度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而《剑桥欧洲经济史》恰恰就是这样一部以欧洲从中世纪向现代经济转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史著作。事实上，从《剑桥欧洲经济史》的总体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比较侧重于欧洲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在此过程中的

制度变迁与政策调整问题，中世纪末期的欧洲经济及其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在其总体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这一部分恰恰是近年来西方学者非常重视而我国研究又极为薄弱的一部分。从编排体例上看，《剑桥欧洲经济史》不仅非常重视欧洲国家在中世纪的经济增长积累以及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的制度变迁，而且将工业化及其随后的全球扩散置于一种自然延伸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从而可以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经济变革时期的制度演进过程与机理提供更加可靠与丰富的理论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欧洲经济史、特别是从中世纪到现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史，也就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这些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方面也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

#### (四)

《剑桥欧洲经济史》全书共八卷，是由著名经济史学家 M. M. 波斯坦等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权威经济史著作，在西方学术界久负盛名。这部著作的策划工作始于战火纷飞的 20 世纪 30 年代，约翰·克拉彭爵士和艾琳·鲍尔是丛书的主要发起人，第一卷出版于 1941 年，第八卷出版于 1989 年，从策划之始算起，历时近 60 年。数十年磨一书，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可以说是比较少见的。

大体说来，《剑桥欧洲经济史》可以分为三部分：

其一，前三卷构成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欧洲经济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即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是欧洲经济而不是其他地区的经济率先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其中，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探讨了农业与农民生活的转变过程；第二卷《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则探讨了欧洲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渠道与转变；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则分析了随着经济活动领域与重点的变化，经济组织方式与政府政策的

相应转变与调整。事实上，近年来非常活跃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是通过对这一时期欧洲经济转变的重新解释而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其二，第四卷和第五卷构成了该书的第二部分，其重点是探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对外扩张以及欧洲的工业革命。其中，第四卷《16 世纪、17 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主要分析经济增长与发展赖以进行的外部环境，即人口增长、科学思想与成就、价格、贸易模式与贸易线路、劳动力供应、大规模公司的组建以及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等；第五卷《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则主要分析工业生产的核心机制、信贷机制、国际贸易机制以及国家作为生产者、消费者以及财政当局的功能等。作者的这一内容安排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国家在现代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早在工业化开始以前就已经确立了，仅仅从工业化自身并不足以回答为什么欧洲国家在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支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其三，本书的第三部分由第六卷、第七卷和第八卷组成，主要研究和分析工业革命以来包括美国与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其中，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收入、人口及技术变迁》重点分析工业革命展开的外部因素；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则主要分析现代工业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如资本、劳动力以及企业家资源的供应等，并且主要是按国家展开分析的，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第八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发展》主要分析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演变。因此，大体上说，这一部分的三卷主要分析工业化的基础条件、增长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变化。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一部欧洲视角的经济史著作，《剑桥欧洲经济史》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对此我们应予以注意。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是最先在欧洲、特别是在西欧发源的。无论是从工业化的国际扩散来说，还是从世界经济形

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欧洲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中都居于中心地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接受或者说承认欧洲中心论的合理性。欧洲中心论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我们必须加以批判，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应该拒绝接受欧洲经济发展进程所昭示的发展模式的普遍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在强调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独特性的同时，又往往忽略了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发端于欧洲的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所确立的制度安排、规则选择等至今仍然起着主导作用。承认这一点，事实上也就是承认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至于欧洲国家的这种中心地位客观上是否合理，是否增进了整个人类的福利，那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需要专门加以探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关注站在时代发展最前列的国家或地区，把它们作为自己模仿的榜样和赶超的对象，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也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把欧洲视为现代世界经济发育和成长的中心因而予以充分注意，是无可厚非的，这种做法本身也并不一定是“欧洲中心论”的体现。当然，对于由于欧洲经济发展优于其他地区而形成的欧洲种族优越论，以及书本中可能隐含的种种欧洲殖民倾向以及作者出于自身立场、观点等对历史事实的不同理解甚至曲解，是应该予以注意和批判的。

## (五)

本书的中文版翻译可谓历经坎坷，备尝艰辛。早在 1998 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就斥巨资向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购买了《剑桥欧洲经济史》（八卷本）的中文版权，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春法博士组织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方面则由卢元孝编审负责编辑事宜。双方在多次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严格的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在随后四年多的时间里，由于主译人员的调整及其工作岗位的变化，而且翻译及编辑加工的难度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致使译稿完成的时间一再延迟，以致在原定的 2001 年 12 月这个最终出版日期之前，我们不得不致函剑桥大学出版社，请求推迟出版时间，并得到了理解与慷慨允诺。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同行们，没有他们的理解与帮助，这样一项文化工程的命运是难以逆料的。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参与这项工作的各位编辑，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这部著作是难以完成的；感谢各位主译人员，在市场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他们能够甘于寂寞，勇于承担起书稿翻译的重任，从而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精神又是何等的可贵！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领导，没有他们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气魄，这样一部宏大的经济史著作是不可能在中国面世的。目前，中国经济史学界正在经历一场声势浩大的“融入世界”运动，如果本书能够对此有所助益的话，则幸莫大焉。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一直未放松对译稿质量的要求，但是，翻译出版这样一部大型的经济史著作，还是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比如说，原书所引文献涉及大小语种数以十计，古今雅俚，纷繁复杂，其中部分虽经多方努力而无法翻译者，只好照录存疑。又比如，由于本书所涉及人名、地名繁多，时间跨度甚大，个别人名、地名因卷而异的情况也恐难以避免。另外，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稿中其他错误也在所难免。所有这些都希望读者不吝指教，以期未来再版时加以改进。

王春法

2002 年 9 月于北京

# 前 言

自 1948 年规划本卷及下一卷要描述更为广阔世界（15、16 世纪的地理发现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将其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史以来，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显然已经变得更为广泛而积极了。这种兴趣的扩大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随着政治的发展而活跃起来的历史和经济研究，而后者又是新兴民族主义的知识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当地的社会与经济以及它们对欧洲商人、传教士、殖民者和行政官员们的反应。新的研究要求对以前已为人们广为接受的许多观点进行重新评价，并鼓励对欧洲史的许多方面进行新的探索，以至欧洲研究也获得新的推动力，欧洲扩张的动机、机构和成就也得到更为细致的讨论，并受到来自各方的更有说服力的批评。我们现在进行的这种讨论也必须是系统的，深入的，但它并不是为了反对一种认为国旗所到之处贸易随之而来的简单理论，而是以阐明二元社会、不发达地区、从属经济、初级生产者（国）、贸易条件、资本形成、受到保护的市場、大量购买和殖民地民族主义这些概念展开讨论。殖民地条约（*the pacte coloniale*）变得高度复杂了。

许多处理帝国主义问题的现代方法都是意识形态的，而且很大程度上都是依照法律和宪法的。然而，当国家的地位获得以后，重心就越来越转移到经济上了。当外部投资枯竭或被排挤出去，人们对新兴国家的同情心被收回，新兴国家不得不去平衡它们自己的经济，以它们能付得起的价格为其国内市场进行生产，以对消费者有吸引力的价格和数量为世界市场生产，并且还得允许必需的国外采购时，这种状况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新兴

国家，不管是作为援助的接受者还是正在成长发育的独立经济的管理者，都是世界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就像它们从中诞生的殖民地一样。这种情况与老殖民地重商主义体系大不相同，后者有《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和《糖税》（Sugar Duties），有殖民地条约和贸易、财政、海运业的独占政策（*exclusif policy*）。它与双重托管制（Dual Mandate System）也绝不相同，后者以相当简单的规定就可以使热带地区的资源为文明世界所利用，也使文明世界的资源为热带的人们所利用。因为在这种托管方式中必然隐含着欧洲优先的因素，至少在评价和控制局面方面是如此；但是，<sup>[XI]</sup>这种优先权作为一种基本假定已经不存在了，只是作为一种经济上的必需而再现。

新兴的不发达地区必须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之中生存，这一现实没有它们必须自己决定怎么做、必须去执行自己的决策这一事实更激动人心，但这并非没有意义。它们的独立地位和行动自由都是新生事物，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们复杂的经济状况是一系列事件持续的结果，通过海上航线将欧洲人带到了它们国家的那些事件，也是由潜藏在那些事件背后的目的和思想所造成的。由于 15 世纪后半叶葡萄牙人的航海大发现，扩张运动随之拉开了序幕，它所带来的变化使西欧和世界其他大洲——非洲、美洲、亚洲，最后是澳洲——都被带进一种崭新的、更加紧密的、持续的经济联系之中。一种新的世界经济被创造出来，在这种经济中，里斯本（Lisbon）和贸易商行（the *Casa da Contratación*）控制了世界的香料贸易，指挥着它们的香料船队抵达它们的贸易中心果阿（Goa），然后停泊于塔霍河（Tagus）。事实证明葡萄牙的管理和财政技巧是不适于这种营利事业的，而荷兰人显示了他们作为干涉他人事务者（*interloper*，来自荷兰语的一个词）的能力，“作为西班牙国王臣民的安特卫普人拥有极为富足的资金，它们把香料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通常提前拿钱买回它们，由此形成彻底的垄断”。这种抱怨来自于英国冒险商公司（Merchant Adventurers）的秘书，他更愿意他们自己获得这种垄断



地位；荷兰控制下的香料贸易对它们的波罗的海和西北欧贸易构成极为重要的补充，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因人而异的看法。这种新兴的且在不断扩大的香料和东方产品贸易实际上被纳入到包括整个欧洲，实际上跨大西洋的贸易体系之中。

在葡萄牙人失去他们的控制之前，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包括东非主要港口在内的贸易模式，在这些港口，来自西非海岸的黑人奴隶在促进殖民地开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殖民地开拓从大西洋诸岛一直延伸到巴西和美洲大陆。糖类贸易使欧洲、非洲和美洲联系在一起，海运业是其重要的纽带。同样，在葡萄牙的支配地位被彻底打破之前，来自印加（Inca）王国和阿兹特克（Aztec）王国的掠夺物、此前从银矿获得的巨额收益都早已开始流入西班牙的国库中了，而哈布斯堡（Habsburg）国王们却发现：他们赖以获得帝国称号并得以维持这一称号的欧洲大银行家们都开始被卡斯蒂利亚（Castilian）对硬币的控制——正是这种硬币而不是西班牙王朝的世袭收入正在扰乱欧洲的币制——所深深吸引。 [xii]

到了16世纪末，出产香料诸岛的农业经济、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国内工业、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阿拉伯人的贸易经济、西非的本土社会、加勒比群岛（Caribbean islands）和西属美洲总督管辖两个省的广大地区的生活方式，无一不深受欧洲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海上新航线被发现，与非洲、亚洲和美洲这些新世界接触变得更加容易和经常，欧洲自身也处在剧烈的重组之中。当然与非洲和亚洲的贸易通道早就开启了，尽管美洲此前不为人知，而且事实上在它被发现之后的许多年人们还一直难以承认这块独立的大陆。穿越亚洲的“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产品带到罗马，中世纪商人从事过殖民地（*kolonialwaren*）贸易，而为现有的营利交易 [它是威尼斯（Venice）、热那亚（Genoa）和比萨（Pisa）财富的主要来源] 寻找新的渠道与渴望建立新的贸易这两个动机共同推动了15世纪的海上探险。当然，这种改变的过程并不彻底，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潮流的隔绝之中。但在人们对此持有绝对的保留意见时，事实依然是：世界